

快手妻子

◎赵自力

“哈哈，又抢到了，我这手够快的吧。”妻子抱着手机，笑得那么傲娇。她又在抢消费券了，别人难得抢一张，她总能抢到两张以上，难怪那么高兴。

自从市政府发放第一批消费券开始，妻子就盯上了这项福利。记得刚开始发放消费券时抢得不激烈，因为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，甚至还怀疑是假的。妻子那次抢了两张，她马上去购物，一下省了好几十元，顿时喜得眉飞色舞，连忙到处告诉亲友说消费券好抢好用。到第二批发放的时候，为了能抢到，妻子做足了功课，还提前定了闹钟，时间一到准时开抢，手指动作间，将消费券收入囊中。我在妻子的带动下，竟也抢到了，能花出去更是欣慰。我们带孩子们吃了大餐，还给她们买了些衣服鞋子类的，使用消费券感觉很过瘾。

后来消费券就不如以前那么好抢了，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们还常演练抢券程序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其实发券时，不管抢到了多少，那种感觉都很兴奋和刺激。

每次抢完，总有朋友发个悲伤的表情，而妻子则会晒自己抢的券，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。大家都笑赞她手气好、手特别快，还有人经过严密分析推理，得出结论说是妻子的手机好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不得不说她下手确实够快的。

如今，抢券的各路“神仙”实在是太多了，好多朋友早早就开始等着开抢，结果多半是等了个寂寞，打开界面空空如也；手快的妻子也常常失手，但她仍旧乐此不疲，说没抢到也不打紧，重要的是参与其中，图个快乐。

还会有消费券陆续发放，妻子充满了期待，说她的快手总会有用武之地的。

重大发现

◎吴佳佳

昨天领到一笔酬劳，是用现金付的。我从幼儿园接了女儿回家，发现老婆不在，就打算去银行把钱存起来。小女儿一边跟着我重新出门，一边问：“爸爸，你要去哪呀？”

“去银行存钱。”

“爸爸，你千万不要把钱存到银行里，一存进去，钱就没了。”女儿拦住我，很认真地说。

这是什么逻辑？我也有点好奇了：“真的吗？能告诉爸爸为什么吗？”

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每年过年时我收到的压岁钱，妈妈都说给我存到银行里，结果后来都没了！”

“丫头，你说得太对了。爸爸的工资也是被你妈存了以后，再也没看到。”

本版投稿邮箱：
2457901059@qq.com

变坏

◎天潼

父亲临终前再三叮嘱，他死后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丧事，周年也无须祭拜。起初我理解为父亲一生节俭，走后也舍不得我们花钱。后来，二哥不顾他的遗言，通知了一些亲友。几个表舅登门上香时，我顿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。

表舅们和我们家关系不近不远，他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姑妈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和他们家组成了一个“团结户”，共用一个厕所、一个厨房。父亲每每回忆那段岁月，都痛心疾首，他说二哥就是跟着表舅们学坏的。

“我已经30多年没上你们家串门了，没办法，姐夫生前看到我就血压高……”二表舅对母亲说。母亲摆了摆手，说算了，都过去了。

二表舅很早就从厂里辞了职，此后从事坑蒙拐骗活动。有时弄回一卡车皮鞋，有时搞来两车啤酒……货款无一例外好些年都未付。小表舅走得更远，曾经被判刑，50岁出头就病逝了。

“我现在也就是在小区里下下象棋、和邻居聊聊天，打发时光。”二表舅描述他的退休生活。如今，他已经70多岁了，即便想“坏”也已经“失能”了。

我的同学大熊和二哥关系也很好，他没有来我家吊唁。离退休还有5年，他在工地上讨生活，抽不出时间。大熊先后坐过5次牢，派出所、社区工作人员对他都十分熟悉。大熊打零工的收入不够他抽烟喝酒，他便啃老。他母亲一身病，舍不得去医院，平日常节衣缩食。

我们以前住的工厂家属大院，有点像电视剧《狂飙》里的旧厂街，诞生了不少“坏人”，但没有出现过高启强这样的大坏人。这些“坏人”都只是坏人中的底层，一辈子没成气候。

父亲常将二哥不学好归咎于早年居住环境恶劣，周围坏人多。然而，大哥和我也处于这样的环境，何以没有学坏？苏轼有一首《琴诗》写道：“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

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”父亲若是读过并理解了，就不会怪别人带坏了他儿子。学坏这种事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

“坏人比老实人聪明，要不怎么都混得吃香喝辣？他们只是没有将聪明用在正道上……”记得以前大熊妈经常这么说，显然是在给儿子找辙，市井之中许多人相信并传播这种说法。

一晃当年的“坏人”们都老了，这辈子何曾比老实人混得好？他们大多活得并不滋润，诸如大熊这样的，晚年谋生计都很不易。所谓吃香喝辣，往往只是一时风光。

所幸有父亲看着，不然二哥多半会和表舅、大熊一样。如今，二哥起码没有案底，是个清白之人。但他至今还没领悟到父亲为他操的心。不过，曾经的“坏人”都已老了，如今成了寻常老人，他们来给父亲上香，倒也没有什么实际坏处。所以，我们默许了二哥对于父亲遗嘱的违背。



敲钉岁月

◎王明华

那是1975年至1976年，我正在上小学，几乎有两年的时间，我同三个妹妹的业余时间包括寒暑假、星期天是在单一的“敲钉”生活中度过的，至今虽然过去40多年，但“敲钉”的经历却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家住在当时的南通县袁桥人民公社（现崇川区秦灶街道），虽然同南通市区紧靠，但隔着一条通吕运河，秦灶便成了标准的农村，而且在南通县，秦灶同幸福、陈桥同属于远离金沙镇的边远地区，在整个南通县是经济最落后的地方。我家一共六人，除了父亲在工厂工作外，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子，户口都在农村。每年生产队年终分配，我家只有母亲一人劳动，都是透支；劳力多的邻居何吉姑娘家是进钱的，这时我们往往向他们家借钱，等父亲拿工资后还上。

父亲1949年之前就当学徒做皮鞋，后来又成为国营利民皮鞋厂的国家工人。父亲虽然只上

过两年小学，但刻苦钻研技术，成为厂里的技术能手，是八级工。1965年代表南通市到南京参加比赛，获得第一名，后获得“技术能手”称号，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“江苏大工匠”！此后，父亲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，用他的话讲，那是让都让不掉。

当时做皮鞋主要是一个手工活，也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在把鞋面与鞋底合在一起上线前，必须借助木鞋楦子用小钉子把鞋面和鞋底钉住；等鞋子上好线后，钉子必须全部拔掉。拔掉后，小钉子就弯了，在那物资紧缺的时代，为了再利用，就需把弯钉敲直，可以变废为宝，同时，做这活儿可以赚钱补贴家用，“敲钉”的工作由此而来。

“敲钉”可是个苦差事，一是钉子小，“敲钉”不能使蛮劲，要用巧劲，要全神贯注，左手右手配合默契，眼睛要盯紧。稍不注意就会敲到手指上，刚开始做这事时手上敲起泡泡甚至敲坏了手指是常有的事；二是没完没了，今天敲完了明天还

有，源源不断，时间长了见了就怕；三是获利太少，一箱弯钉四五十斤，只有五元钱，一个月课余时间不停地敲，只能敲两箱，挣十多元。但哪里还有其他途径挣钱呢？我同三个妹妹的业余时间不是用来学习也不是用来补课，而是日复一日机械地敲个不停。在敲钉的日子里，开始是吃大锅饭，敲多敲少一个样，这样不利于任务的完成。于是，我在1975年12岁时就在家实行了包干制。由于妹妹们年龄不一（一个10岁、一个8岁，还有一个最小的只有6岁），便根据年龄的大小分配不同的任务，谁先敲好，谁就可以出去玩，这样大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。今天想来，改革开放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，还在我后面几年。

上中学后，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国家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，皮鞋厂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，用钉量不断下降，甚至不需用钉。种种原因导致我们后来再也没有“敲钉”，此后也永远没有再为了生活而“敲钉”。